唐代潞州地区墓志的书写格套及演变
——兼谈作为移民史史料的误区

仇鹿鸣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唐代潞州地区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多涉及社会中下阶层,墓志大量自云祖先“因官徙家”“某某太守+某某侯”等是一种书写格套,多依据“书仪式”文本拼接而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当视为移民史史料。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志盖形制也会因时而变,晚唐五代潞州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全国渐趋一致。上党苗氏家族迁至洛阳后,放弃潞州当地墓志简陋的书写格套,完成了祖先叙事的士人化,“上党太守+某某侯”仍时而出现家族记忆中。

关键词: 潞州墓志;格套;上党苗氏

中图分类号:K 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4)02-0099-14

唐五代墓志素以长安、洛阳一线出土者为大宗,加之这一地区人文荟萃,新出碑志多能与传世文献相发明,契合宋以来金石学“证史补史”的传统,广受学者重视。不过,若以人口、经济等因素加权计算,山西长治地区出土的墓志数量,堪称有唐之冠。最早措意于此的是日本学者矢野主税,他利用罗振玉《山右冢墓遗文》中的录文,探讨唐代潞州的人口流动、郡望及本贯书写、家族葬地等问题,并与邺城、襄阳等地相比较,认为隋唐时代全国范围内豪族因官移贯,形成了新的地方乡邑社会。① 近年随着资料刊布的增加,潞州地区制作墓志的传统,日益凸显,学者估算总量在 500 方以上②,实际恐远超此数。③

这批材料为学界注意,缘起《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整理过程中发现志盖题诗现象④,后又观察到潞州墓志志盖多有题诗、八卦纹饰与兽面铺首等特定样式或组合。⑤ 尽管长治地区出土墓志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大同地区碑铭所见民族融合历史研究”(21@ZH030)。
* 本文蒙周鼎先生提示意见,特此致谢。

① 矢野主税:《隋唐時代の上層郷邑社会(1)》,《第一経大論集》第 7 卷第 3·4 号,第 23—38 页。

② 张葳:《由隋唐潞州申屠氏所见中古的移民与聚落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43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74 页。

③ 刘文涛在当地做了更广泛的调查,并提示高平随弘堂藏潞州唐志 290 方这一线索,认为总数在 1000 方以上,《长治出土唐代潞州墓志初探》,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第 6—7 页。

④ 陈忠凯、张婷:《西安碑林新藏唐—宋墓志盖上的挽歌》,《出土文献研究》第 8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2—302 页;胡可先:《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549—573 页。其中陈文注意到《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存类似情况,勾连了新旧材料。除此之外,梁海燕《唐人墓志盖题诗考论》据河北正定县三义厚古玩店施荣珍所藏拓本订正陈、胡两文若干录文讹误,并补充八首流散墓志志盖上的题诗,《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 年第 4 期,第 8—16 页。

⑤ 刘天琪:《挽歌、铺首、八卦符号与墓志盖题铭——以新发现的晋东南地区唐代墓志纹饰为研究重点》,《美术学报》2011 年第 5 期,第 58—67 页。新近综合性研究参读郭桂坤《也谈墓志盖上的“挽歌”——兼析中晚唐五代墓志铭创制中的“泽潞模式”》,收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1—229 页。按郭文辨正志盖题诗不宜称为挽歌,可从。

数量甚夥,提供了复原唐代潞州内部社会结构与人群构成的可能①,由于志主多属社会中下阶层,志文简略,常用套语,即使有部分亲属关系可相互勾连,较难展开深入的研究。学界的尝试大约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墓志材料讨论地方家族的迁徙与仕宦。② 另一取径是梳理考古发掘的长治地区唐代墓葬,发现部分墓葬形制与使用随葬品的规格皆远超志主朝散大夫之属的身份,结合墓志材料,认为这批"逾制"墓葬,志主多是追随李渊起兵太原元从及其后裔。③ 无论从志盖形制、志文格套还是墓葬规格、丧葬明器等方面入手,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潞州模式"之说④,揭示其鲜明的地域特征。

一、"英雄祖先"的虚与实

唐代部分墓志多存格套化文字,学者早有注意。岑仲勉曾指出"盖唐人作文,已有活套,转相剿袭",举出安神俨、康杴两人墓志各有五十九字雷同,因两志刻立时间仅相差一年半,同出北邙,疑出自同一人之手⑤,进而举出安师、康达两志尽管姓氏不同,叙述先世源流犹复抄袭,吴玉贵又补充安娘、史诃耽墓志两例。⑥ 赵超枚举柳婆归、秦详儿墓志与总章二、三年间李氏、赵氏、王氏三志,文辞雷同⑦,耿慧玲则指出唐代宫人墓志亦多重复,并析分出四种格套⑧。目前来看,行文多用格套语甚至全篇雷同的墓志主要集中在入唐胡人、宫人、女性等特定人群中。

以中下层士人为主的潞州墓志中,行文格套现象尤为普遍,郭桂坤已枚举多例,指出此类文本因袭的现象包含序文、描绘葬地环境的套语、志铭、志盖题诗等多种类型。⑨ 传统金石学研究注重从石刻中提取姓氏、爵里、世系、民族、仕宦、婚姻等信息与传世文献互证,既往发现的格套语多为表彰志主德行的虚美之词,似不影响以上各类信息的有效性。若进一步分析潞州地区墓志文本,不免产生新的疑问。

利用潞州出土墓志展开的先行研究中,前揭张葳基于移民史角度的两篇论文,资料上用力颇深,对志文记载的可靠性已有怀疑。循此线索,进一步收集材料,不难发现唐代前期潞州地区墓志,存在某些流行的格套,其中较易辨识的一种叙及志主家族源流,多采用"某某太守+某某侯"的组合,使用的爵名

---

① 许曼在唐宋变革的视角下,讨论了潞州地方精英墓志中表达的郡望、道德、文武等方面的观念及演变,也注意到安史之乱前后志文叙述风格的变化。Man Xu, "China's Local Elites in Transition: Seventh- to. Twelfth-Century Epitaphs Excavated in Luzhou",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30, No. 1, pp. 59-107.

② 张葳:《因宦徙居:唐代墓志所见潞州人口迁入情况的个案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5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4—212 页;张葳:《由隋唐潞州申屠氏所见中古的移民与聚落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43 辑,第 174—194 页。胡耀飞:《上党雍氏考——藩镇时代下层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晚期中古史存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2—57 页。

③ 卢亚辉:《墓葬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宋历史评论》第 4 辑,第 106—137 页。

④ 各人表述稍有不同。郭桂坤称为"泽潞模式",《也谈墓志盖上的"挽歌"——兼析中晚唐五代墓志铭创制中的"泽潞模式"》,《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21—228 页;卢亚辉名之曰"潞州模式",《墓葬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宋历史评论》第 4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30—132 页;另葛承雍分析长治出土灰陶俑具有"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特征,命名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 年第 12 期,第 44—55 页。

⑤ 岑仲勉:《金石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93 页。

⑥ 岑仲勉:《金石论丛》,第 83 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68—272 页。

⑦ 赵超:《读唐代墓志札记三则》,《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7—190 页。

⑧ 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的作用》,《唐研究》第 3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3—242 页。

⑨ 郭桂坤:《也谈墓志盖上的"挽歌"——兼析中晚唐五代墓志铭创制中的"泽潞模式"》,《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25—228 页。

囊括潞州辖下的上党、长子、潞城、屯留、壶关、襄垣诸县,这类爵名无疑是地方文人向壁虚构,并非实际授予。其中以“上党太守+屯留侯”的组合最为常见,目前检得当地至少有崔、李、浩、毕、申(申屠)等五族自云先世受封屯留侯。

表一

志主	相关内容	葬年	出处
浩宽	上党太守、屯留侯浩怜之后。	永徽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文物》2004-10
李楚	祖纂,齐长平郡守、屯留侯。	显庆二年正月	《补遗》9-430
崔穆	祖晖,扬州刺史、屯留侯。	总章元年三月一日	《汇编·山西》23
浩玄	祖略,前魏上党太守、屯留□,子孙因家此焉。	乾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补遗》8-274
申屠道	雁门太守备之后,流爵屯留,因家上党。	乾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秦晋豫续》259 号
毕识	十二代祖轨,并州刺史、屯留侯,憩乘于兹,因家此地。	载初元年壹月二十四日	《西南新藏》097 号
申珍	乃以金城建族,尊五等于屯留。申备之后,延芳望表,介于阳远。	神龙元年三月	《碑林新藏》108 号
申屠徵	其先金城人,上党守、屯留侯备之八世孙,故今为潞城人。	开元二十七年三月十日	《碑林新藏》167 号
崔寔	逮晋年中,十四代祖父晖,守,封屯留侯,子孙因家焉。	天宝六载二月十四日	《三晋石刻·长治屯留》16
崔日进	以至十八代祖晖,晋太尉、上党太守、开国公,封屯留侯,子孙因居上党矣。	大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碑林新藏》271 号
李锐	次远祖汉敦煌公,任兖殷二州刺史、东平将军、继屯留侯,食封二千户。	大中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汇编·山西》163

上述五姓皆自称先祖尝封屯留侯,自非历史的实相,恐怕也不是家族迁徙集体记忆的留存,而是在墓志撰写时运用了共同的模板或拼接了相近的格套,这类格套的选择与搭配也相当随意,从墓志记载的卒葬地来看,以上诸姓在潞州的著籍地,多数并非屯留。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同一姓中又有如上党苗氏那样分别自云先世尝封襄垣侯、潞县侯者,而同样号称受封潞县侯者,还有上党秦氏、程氏、王氏等,而程氏亦有载祖先封长子侯者,即在同地同姓中,对先世封爵的“记录”存在大量抵牾之处。

表二

志主	相关内容	葬年	出处
苗宁	远祖上党太守,后封襄垣侯,苗,屯留县人也。	开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碑林新藏》153 号
苗明	十一代祖启,汉景帝后元三年为大司马,封潞县侯,食邑屯留,子孙因即家于此焉。	显庆五年五月九日	《补遗》8-266
程芝	远祖上党太守,封潞城县侯,子孙因家焉。	先天元年十一月七日	《唐文续拾》卷 2
霍休及妻程氏墓志	程轨封长子侯、孙祁轻车都尉之□女。	显庆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碑林新藏》034 号

除了这一较为复杂的组合,潞州出土墓志自述徙居本地的原因,常宣称始迁祖为上党太守,以此自高身价。据笔者初步统计,自云祖先因仕至上党太守、迁居本地的墓志约 40 方,甚至流寓当地的粟特人

也接受了这一叙事,如康琮墓志云“其先家本会稽郡,远祖后魏上党守,子孙因居焉”①,连方外之士亦不能免俗,如释灵斡,“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于上党,遂随封而迁焉”;释道胄,“姓辅,京兆始平人。祖任上党太守,遂居长子焉”②,而“某某太守+某某侯”可视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嵌套”。总而言之,与其他地区不同,潞州墓志普遍自云先世自外埠迁来,形成了简繁不同的三种格套,最常见的泛称因官徙于上党,稍繁复者云远祖任上党太守,因官徙家,最为复杂的则是上文剖析“某某太守+某某侯”的组合。流行潞州当地的这一嵌套,虽编排得“自圆其说”,因有违制度反易被学者辨识,但不难想见,拟构这一较为复杂的祖先叙事并载入墓志者,当是潞州民间社会中层次较高者。③

同时,这一嵌套的流行也具有一定的时间性,据目前所见资料,其源流可追溯至北魏末。正光二年(521)郭翻墓志云:“七世祖容,晋上党太守、阳阿侯,子孙因家焉”④,东魏天平元年(534)程哲造像碑记其先祖程丰“值晋室道衰,刘氏称霸,曜勒王弥,袭帝洛川,愍帝升祚,以丰中良,才堪抚捍,即除上党太守。后以刘石鸱峙,触地豺狼,遂因守任,即居上党”。⑤ 其中程哲碑对先世迁徙与历官经历的记述非常细致,如云“乃祖憘,字申伯,魏文帝景元中与邓艾伐蜀,受律西征,恭行天诛,使城〔成〕都自溃,刘禅稽颡。帝命使持节征北将军、青州刺史、特进、广年侯”,详尽与可信并不能划上等号。造像碑尽管攀附了不少程姓名人,叙事荒腔走板,如汉末确有青州刺史、征北将军程喜,而非魏末,事迹则无一对应,碑文更云程憘弟为曹魏名臣程昱,所记历官又皆误。⑥ 碑文将史传中的程姓名人与上党程氏先世记忆嫁接在一起,或本自谱牒之类的材料,囿于知识水平,存在大量史实错误。由此观之,当地大族自云先世为“某某太守”“某某侯”的传统,或与十六国以降,上党地方大族竞争中自高门第的需求有关。

“某某太守+某某侯”格套在墓志中真正流行要到入唐之后,安史乱后渐少行用。⑦ 在此之前,即使出自同一家族,叙述类似的内容,多用另外的套语。如隋开皇二十年(600)申成墓志“九世祖备,汉建安

① 拓本刊毛阳光《墓志所见唐代潞州地区的粟特人》,夏炎主编:《中古中国的知识与社会》,上海:中西书局 2020 年版,第 97 页。

② 《续高僧传》卷一二、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12、876 页。考虑到僧传的史源,所载当本自行状、碑志。

③ 因官徙家是唐代墓志中的套语,因过于简单,虚实尚难遽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墓志中自云“因官徙家”的比例远超两京,这与一般认为长安、洛阳四方辐辏、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常识相悖。前揭矢野主税《隋唐時代の上層鄉邑社会(1)》一文即注意到潞州、相州、襄阳等地墓志中多云因官徙家,不过其相信墓志自述迁徙经历及郡望的可靠,将之视为地方豪族因官僚化、经历了全国性的流动表现,《第一經大論集》第 7 卷第 3・4 号,第 1—45 页。即便如此,潞州墓志中绝大部分皆云“因官徙家”,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当地发展出某某太守、某某侯,特别是“某某太守+某某侯”的格套,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很少见于其他地区。

④ 常书铭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6 页。郭翻墓志出土于高平,在唐代属泽州,墓志云封阳阿侯,按《汉书・地理志》记阳阿属上党,北魏时隶高都,知“上党太守+某某侯”格套中的上党起初仍以汉郡为范围,故在潞州周边地区亦有行用。

⑤ 《山右石刻丛编》卷一,按此碑原在长治市袁家漏村,今移至山西省博物院,《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0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4949—14950 页。另有武定七年刘腾造像碑,出土地点虽不明确,从其使用的“秦征上党太守,世袭路县侯”格套来看,当亦出自长治,拓本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6 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7 页。

⑥ 《山右石刻丛编》跋文对此类错误已有详考,《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20 册,第 14950—14952 页。

⑦ 不再流行并不意味着绝无行用,这类格套在中唐后使用的例子除表一所列外,后晋开运三年李行恭及妻陈氏墓志云“府君讳行恭,玄元皇帝之苗裔,胤封江下王,后为上党太守”,亦是其中的变体,仇鹿鸣、夏婧:《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开运 0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06 页。

初莅雁门郡守。祚土屯留,本枝百世,因即居焉”①,大业三年(607)浩喆墓志云“远祖怜,以英略雄图,建功汉室,分竹上党,祚土屯留,因是家焉”。② 将本郡辖下的县名径直充作爵名是一种粗鄙的攀附,申氏、浩氏早先使用“祚土屯留”之类的套语无疑更为雅驯,可见格套的演变不一定是“进化”的。尽管申、浩两族皆属当地豪强,但在墓志撰作过程中仍受制于流行的格套,作为丧家似无太强的主动性。程哲造像碑在文本拼接上虽然繁复得多,从对前代史传的掌握、对当时典制的了解等方面来看,反映的知识水平,仍与其他地方大族相类。③

“某某太守+某某侯”的格套虽然误读了官制,但满足了地方大族自炫先世的现实需求,这一格套作为跨家族流动的知识,未必是具体某个家族的发明,反倒可能是某一时期地方性知识植入祖先记忆的结果,成为缘饰各家族历史的“公共”资源。在潞州墓志中,我们还能识别出一些更具体的家族性记忆,学者已经指出,当地申(申屠)姓墓志多提及“雁门太守备”,将他视为家族迁徙过程中的关键人物④,在当地王姓、崔姓墓志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英雄祖先。

> 远祖钟,授使持节冀州诸军事、上党太守,侯封路县。⑤
> 其先太原人也,帝喾之苗裔,王钟之后,分竹剖符,兰桂迁于斯邑。⑥
> 远祖钟,晋朝上党太守,子孙因而家焉。⑦

王钟是当地王姓传说中的始迁祖,而在崔氏家族的传说中扮演类似角色者名崔晖,始见于大业十一年崔玉墓志,云“秦皇受□用始祖崔伯基为太傅,封清河。晋后膺期,因官住此。太祖崔晖,并、雍二州刺史,食邑屯留”。⑧ 唐代的案例表一中已有枚举,个别有记作崔浑者,如崔虞延墓志载“十二世祖浑,晋怀帝辅京将军,迁上党太守、屯留侯”⑨,当是刻写之误。

申(申屠)备、王钟、崔晖,这些当地人传说中的始迁祖,皆不见于史籍,在志文中往往又与“上党太守+某某侯”格套结合,流行的时间主要在唐前期。⑩ 如果扩展视野,唐代地方家族中对英雄祖先的描绘,不仅见于潞州,如 P.2625《敦煌名族志》与张怀寂墓志皆将敦煌张氏的远祖上溯至因躲避霍光迫害、逃难至敦煌的张襄,成为敦煌张氏共通的祖源记忆。⑪ 这种家族记忆乃至地方性知识的形成,往往带有建构的成分,志文对他们始迁当地时间、任官的记载也多有分歧,不能径直认为反映了某种历史事实。

---

①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 2007 年版,第 50 页。按本方墓志志主姓氏阙,整理者定名为“谢成”,恐误,据志文自述的家世源流,当作“申成”或“申屠成”。潞州地区墓志中,申氏、申屠氏分享了同一套祖先源流,可视为同族,参读张葳:《由隋唐潞州申屠氏所见中古的移民与聚落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43 辑,第 174—178 页。

② 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垣隋代浩喆墓》,《文物》2004 年第 10 期,第 12 页。浩喆墓志与前引浩宽墓志,同出襄垣浩氏家族墓地,系浩宽祖父。

③ 这类地方豪强在攀附先世时往往出现时代或人物事迹的错置,如洺州刘思敬墓志云“汉有校尉向公,后汉丞相珍公,魏有凤阁侍中祎之,晋相王司马伯庄,梁有廷尉孝绰,又兵部校尉子玄,皆其裔也”,亦可见这一人群知识水平之一斑,《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同光 007,第 104—105 页。

④ 张葳:《由隋唐潞州申屠氏所见中古的移民与聚落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43 辑,第 175 页。

⑤ 王能及妻牛氏靳氏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82 页。

⑥ 王里奴及妻李氏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219 页。

⑦ 王贞及妻李氏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 1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04 页。

⑧ 崔玉墓志,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 5 册,北京:线装书局 2007 年版,第 104 页。

⑨ 拓本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26 册,第 40 页。

⑩ 张葳《由隋唐潞州申屠氏所见中古的移民与聚落变迁》指出唐前期潞州申(申屠)氏墓志常将远祖攀附申屠嘉,始迁祖追至申屠备,至天宝以后这类文字基本消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43 辑,第 184 页。目前检得追溯始迁祖为王钟的王姓墓志约十余方,皆在唐前期,仅崔氏家族在天宝后仍有追溯至崔晖者,见表一。

⑪ 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34 页。

严格而言,张襄、申备、王钟、崔晖这些传说中始迁祖未必实有其人①,而是经历了知识层累、整比与重构之后,才被塑造成“英雄祖先”。如前揭浩喆家族墓志皆记始迁祖为浩怜,浩玄墓志虽然亦云先祖为“前魏上党太守、屯留□”,但名“浩略”,是同一姓中尚未整合完成的反映。

学者已揭示中古士族墓志中关于远祖的叙事往往带有攀附的色彩②,值得注意的是潞州墓志作为地方中下层士人的材料,对于四世以内祖先官职的记载,也多有夸饰。以考古发现的浩氏家族墓为例,该墓地出土的五方墓志对同一祖先历官的记载却不相同,如浩宽墓志记“父钦,隋任长乐乡长,又任县功曹”,浩顷墓志云“祖钦,齐任韩州主簿”,浩约墓志载“曾祖钦,晋阳令”,浩喆墓志记“父买,折冲将军、河东太守、渔阳镇将”,浩宽墓志云“曾祖买,周任镇西将军”。③ 这些差异或仍可用墓志各记浩买、浩钦历官中的一任勉强弥缝。浩氏家族作为地方大姓,发掘的三座墓都是砖室墓,其中浩喆墓还是隋代山西唯一的双砖室墓,足见家雄于财,至于五位志主,浩喆虽自云官至魏郡太守,但仕宦经历不无疑问④,浩宽、浩顷、浩廉皆属处士,浩约版授绛州曲沃令,与本人的情况相反,墓志叙其四代以内祖先,多有仕宦经历,却记载分歧,恐难信从。不但镇西将军、河东太守云云纯属夸饰,其他州县之职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浩氏家族的情况并非孤独例,同属考古发现的乐方、乐道仁祖孙墓志,乐道仁墓志“曾祖恂,齐朝司徒、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扬州都督。祖方,隋任潭州长沙县令”,乐方墓志仅记其父为隋朝散大夫,本人因参与李渊起兵,亦获朝散大夫的散职,并无职事官。⑤

近年刊布的潞州地区墓志,虽是流散出土,勾连家族关系,亦能发现类似的情况。如王正宰墓志云:“高祖羡,朔州刺史、朔方王。祖智,并州州主簿、商州别驾。父荣,上党郡功曹”⑥,其子王轨及妻李氏墓志“曾祖智,周举孝廉,除岐州别驾。祖荣,汾州介休县令”⑦,王羡朔州刺史、朔方王云云固不可信,王正宰、王轨父子墓志述王智、王荣历官也无一相合。苗文、苗质兄弟叙及父祖仕历时亦迥然不同,苗质墓志云“祖荣,随授朝散大夫。父偘,唐初朝议大夫”⑧,苗文墓志则记“(曾)祖荣,随授庆州华池县令……父偘,唐授齐州长清县令,诏授上□都督”。⑨

李渊太原起兵后,招兵买马,不吝爵赏,曾广泛授予普通军士朝散大夫以上的散职⑩,唐前期潞州墓志中多记本人或父祖带有朝散大夫之类的散职,并发现一些高规格的随葬品⑪,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如乐方墓志、苗质墓志虽记其祖、父为隋朝散大夫,其实也是李渊假命所授。除了这些散职外,对墓志所

---

① 如长治地区出土的高盈墓志云“汉镇北将军、上党太守高伯之后”,高伯便不像真实的人名,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142 页。

②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60—74 页。

③ 目前考古发掘的浩氏家族墓有三座,浩喆墓、浩宽墓、浩顷墓,又追回同一墓地出土的浩廉、浩约墓志,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垣隋代浩喆墓》,《文物》2004 年第 10 期,第 4—17 页;山西大学文博学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唐代浩氏家族墓》,《文物》2004 年第 10 期,第 18—35 页。

④ 浩喆墓志记其先后任北齐岳阳县令、北周汾州仵城县令、隋魏郡太守,其中岳阳魏齐时称安泽,大业初方改名,仵城或为伍城之误,两处虽属小失,已知撰者不谙典制,这两任皆在上党附近,尚符合其地方大族的身份。入隋后,浩喆已年近悬车,骤典山东大郡,尤其是北周末尉迟迥据相州起兵,隋朝对此控制严密,选任甚重。即使所记不虚,或是版授太守。另浩喆墓志记其父、祖历官,皆有明显夸饰。

⑤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 年第 9 期,第 462—466 页。

⑥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73 页。

⑦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228 页。

⑧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0 页。

⑨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317 页。按苗文墓志未记其祖,曾祖荣当是祖荣之误刻。

⑩ 温大雅撰、仇鹿鸣笺证:《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卷二:“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北京:中华书局 2022 年版,第 101 页。

⑪ 卢亚辉:《墓葬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宋历史评论》第 4 辑,第 106—137 页。

记志主及先世所任职事官,当存疑待考。前揭程哲造像碑,对高祖程周以下四世历官也有详细记载,云“高祖周,上党太守,慕容超命为功曹,东燕建兴七年除镇军将军、常山太守”等等,可信度亦不高。

二、墓志书写格套的演变

从文本上来看,唐代前期潞州墓志侧重记述志主的家世、历官及迁徙经历,上文所考那些虚实相间的记录,构成了其中的核心。但无论墓志的文本格套,还是志盖的装饰组合,均非一成不变,存在明显的流行更替。如前贤留意较多的潞州墓志志盖多饰有铺首与题诗这两个特征,并不具有同时性。① 前者隋代即已出现,多见于盛唐②,后者自开元后才日益流行,两种装饰题材虽一度并行于开元天宝时,并不互相交杂,恰好反映了流行的一起一落。开天间,潞州墓志书写格套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开元十七年(729)七月,因玄宗早年曾任潞州别驾,升潞州为大都督府③,这一政区升格,立刻在当地墓志文本中得到体现,卒于是年七月、葬于十月的郭仵墓志即云“遂因祖宦居焉,乃为大都督府潞城县人矣”。④ 开元二十一年彭珍及妻郭氏墓志题曰“大唐河东上党郡大都督府屯留县故彭君墓志之铭并序”⑤,开元二十三年李神及妻郭氏墓志题作“大唐故潞州大都督府长子李君墓志铭”。⑥ 彭珍、李神两人系处士,无事迹可称,却在志题上刻意凸显政区变化,透露出地方文士对政治信息的敏感与自矜乡里的努力,同时留存了“上党郡大都督府”这类在新旧格套转化中“非驴非马”的痕迹。李神及妻郭氏墓志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志盖题诗的墓志,或可窥见志石的物质形态与志文书写格套两者演变的交互性。⑦ 开元二十七年浩览墓志云“厥后子孙因官家于上党□州大都督府,今长子县人也”⑧,浩氏是潞州地方大姓,浩览与表一提及几位浩氏家族成员当属同宗异支。结合上文的讨论,可知潞州同姓墓志中,亦因流行格套的变化,文本上随之调整。玄宗在潞州墓志中留下的另一痕迹是志文中常以“龙潜地”自诩,如阎叔汶及妻米氏墓志云“本茔兆潞龙潜地人也”⑨,不过“龙潜地”一词被纳入墓志格套较晚,目前检得十余方,多数在大中、咸通年间,最早一方是大和八年(834)田万昇墓志,“迁居潞□龙潜处”⑩,田万昇是外来移民,其父田意真墓志仅云“人无怀土之心,匪唯流于上党”⑪,或为“龙潜地”套语的出现标识一上限。

晚唐以降,潞州地区墓志书写格套也有一定的变化,对于家族迁徙的叙事趋于简化,多以郡望辅以“因官逐任”“子孙兴焉”等套语,但会详细记录志主现居的乡里。⑫

---

① 刘文涛《长治出土唐代潞州墓志初探》总结志盖样式的转变:高浮雕动物铺首消失,志心纹饰中团花、动物继续沿用,但工艺减退,新出现志盖题诗、八卦纹饰及志盖四侧十二生肖纹饰,第 16—17 页。

② 张婷:《简述西安碑林藏一批山西墓志装饰纹样》,《碑林集刊》第 14 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4—275 页。

③ 《唐会要》卷七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9 页。

④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296,第 1360 页。

⑤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 页。

⑥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404 页。

⑦ 李神及妻郭氏墓志志盖图版见陈忠凯、张婷《西安碑林新藏唐—宋墓志盖上的挽歌》,《出土文献研究》第 8 辑,第 299 页。

⑧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415 页。

⑨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759 页。

⑩ 《唐代墓志汇编》大和 082,第 2155 页。

⑪ 《唐代墓志汇编》元和 114,第 2029 页。

⑫ 许曼也注意到这一点,除了居住地与葬地,晚唐五代的潞州墓志也会更详细地记录家庭成员的情况,Man Xu, “China's Local Elites in Transition: Seventh- to. Twelfth-Century Epitaphs Excavated in Luzhou”,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30, No. 1, pp. 79-80。

本茔兆晋云东龙潜地婴儿邑大禹祠右永济乡之贯居也。①

府君先望彭城郡人也,后乃先世因官派流之居于上党县永丰乡黄雁坊为家焉。②

其李氏,陇西丞相直□座〔祚〕胤也。因官逐任,遂为潞人,贯上党五龙乡东故县村,故壶关旧邑。③

因官逐任,各处生涯,不归松柏,乃派流于□关县壶口乡治梁里也,南阳护村为桑梓。④

这类记载当然是可靠的,但被记录下来的原因,恐怕未必是对著籍地的重视,而是在某种新的格套指引下的"完形填空"。开天以后,潞州墓志便已出现简化乃至省略家族迁徙经历与英雄祖先的趋向,新的格套大约至大中、咸通之后渐流行,较之于一般墓志仅在文末记录葬地时提及乡里,往往在开篇即郑重介绍志主现居里贯,也会详细描述家族坟茔的具体位置及创置、迁移的过程。

后因官随任,登涉潞州,寄客居于府城西北廿里壁子村。三代坟茔列在村东而首,本望在于坟〔汾〕州西河,□致别业于上党,故为此地人焉。⑤

承周文王之胤绪,贯居上党县潞邑龙潜地人焉……买太平乡百姓刘玘地,周围半亩,充新坟一所。前望羊头之侧,后枕黄城之紫盖;左连延庆之阁院,西接彰蒲道。⑥

取显德四年丁巳岁十一月癸未朔八日庚寅于府城西南七里创买茔阙。东至郝家庄约二里,西至狐领□三里,南望黑芦布约三里,北至官道。⑦

较之里贯,祖坟位置、新茔置买等信息对于丧家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晚唐五代潞州墓志中,这类信息较多地被保留下来,恐怕也是因为流行格套的改变,而非丧家主观意愿的推动。这种详细记录里贯、茔域乃至买地信息的书写格套在晚唐五代中下层墓志中颇为常见,并非仅流行于潞州一地。如洺州秦君墓志、魏州乐靖墓志、慈溪罗韦伍瓷墓志等皆如是。⑧

从流行范围而言,唐代前期"某某太守+某某侯"文本格套与志盖上兽面铺首的造型仅见于潞州本埠⑨,盛唐之后出现志盖题诗以潞州为中心,亦扩散至泽州及河北等地。其中与潞州往来密切的泽州较多,如邢播墓志、浩义伏墓志皆如是。⑩ 李本墓志志盖亦刻诗,志文记"比是泽州晋城县人",因仕河阳而徙居怀州,当是作为移民保留了旧的葬俗。⑪

潞州当地数量庞大、行文格套的墓志绝大多数不题署作者,难以确认撰写这类文字民间文士的阶层。河北宣化出土乾符六年(879)杨釼墓志提示了一个线索。墓志署"凡六百九十字礼生任君赞述并书",志文开篇自"天地推运……遂封号于洪浓郡"近百字与同一墓地出土未署作者的杨少愃墓志完全一致,两志后半"同万物以覆载,共阴阳而不殊"等套语亦相类,杨少愃葬于大中六年(852),间隔近三十

① 李荣及妻常氏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715 页。

② 刘嵩及妻张氏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879 页。

③ 李继墓志,《五代十国墓志汇编》长兴 012,第 172 页。

④ 陈晟墓志,《五代十国墓志汇编》显德 014,第 398 页。

⑤ 任素妻李氏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826 页。

⑥ 武平墓志,《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第 681 页。

⑦ 连思本墓志,《五代十国墓志汇编》显德 035,第 434 页。

⑧ 秦君墓志,《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天祐 022,第 87 页;乐靖及妻袁氏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7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2 页;罗韦伍墓志,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 页。

⑨ 目前山西地区可供比较的同类大宗材料是《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汾阳市卷》两书刊布的唐代汾州出土墓志,总数超过 150 方,仅个别墓志能看到相近的格套,如任福墓志云"后汉五世祖父拜此郡太守,封侯家于此",王仲璋主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2 页。

⑩ 邢播、浩义伏墓志分见《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同光 006、天福 006,第 103、218 页。

⑪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显德 015,第 399 页。推测河北地区出土其他几方使用刻诗志盖的墓志,或也与泽潞地区的移民有关,如成德邢汴墓志、洺州刘思敬墓志,分见《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天祐 008、同光 007,第 70、104 页。

年,志文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①,由于杨少愷墓志在前,这一模板绝非礼生任赞自创,而是利用了同样的"书仪式"文本。② 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慈溪上林湖发现的瓷墓志中也有不少格套化的文句,其中余景初妻严氏、余备妻刘氏两志,雷同处甚多,两志皆题乡贡明经翁延寿撰。③ 西安出土孟秀荣墓志与王怡政妻刘氏墓志,描述女性、子女的文字及铭文几乎相同,其中王怡政妻刘氏署"乡贡进士崔愿撰"④,这些例子都能看出袭用、拼接某一范本的痕迹。与学者更为熟悉的官僚士大夫墓志不同,中下层人士的墓志撰写时往往有所凭依。⑤

即使在中唐以后墓志普遍题署撰者的风气下,这类依据格套文本完成的中下层墓志,绝大多数仍不记作者,据上文三例推测,乡贡进士、明经之属大约是这类文字作者身份的上限,较之其他两位甘作文抄公,崔愿确实还做了一番移花接木的工作,显示出"文学"上的优长。值得一说的是任赞礼生的身份,唐于太常寺、礼院置礼生⑥,归义军曾设伎术院,掌典礼祭祀、阴阳占卜、天文历法之事,伎术院的学生即被称为礼生⑦,但任赞本人恐非系属某一官署的礼生⑧,而是民间约定成俗的称呼,当即明清史学者所谓在地方社会中扮演仪式专家角色"礼生"的源头⑨,敦煌伎术院与阴阳学有密切的关系,书仪类文本也是礼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显示两者间隐微的联系,因此这类墓志格套文本主要的使用者,或是各地以堪舆占卜为业,熟悉祭祀、丧葬等仪式的民间文士。

三、墓志文本的"士人化":上党苗氏的个案

一旦潞州当地家族因宦游迁居两京,便会抛弃这类地方性格套。有唐一代,潞州最重要的官宦家族是本贯壶关的苗氏,肃宗朝宰相苗晋卿即出于此。中晚唐潞州当地墓志中亦有自称与之为宗亲者,如郭骞及妻苗氏墓志云"夫人壶关苗氏,故山东道黜陟使兼侍中进〔晋〕卿之昆孙、处士定之次女也"。⑩《旧唐书·苗晋卿传》云其世以儒素称,祖袭夔,高道不仕,父殆庶,官至绛州龙门县丞,早卒⑪,家族本无世宦传统,大约开元时因苗晋卿进士及第,方入两京。天宝六载(747),苗晋卿自河北采访使任上入计,上

---

① 杨少愷墓志中"我公杨氏讳少愷菀氏夫人以咸通十一年四月三日合附同棺也"一句插在"员有郡官"与"其先姻承高辛氏之苗裔"中间,颇突兀,除此句外,两志开篇文字完全相同,此句当是菀氏合葬时补刻,志文当撰于大中六年二月杨少愷入葬前。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7 期,第 34 页。另杨釵墓志志题与志文皆误作"洪浓",杨少愷墓志不误。

② 《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7 期,第 27—34 页。

③ 《越窑瓷墓志》,第 162、164 页。

④ 杨娟:《西安碑林所见唐代墓志铭文字因袭一例——〈孟秀荣墓志〉与〈王怡政夫人刘氏墓志〉》,《碑林集刊》第 11 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5—156 页。

⑤ 许曼曾推测北宋潞州墓志当有模板,如本文所论,在唐代即有模板,而且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Man Xu, "China's Local Elites in Transition: Seventh- to. Twelfth-Century Epitaphs Excavated in Luzhou",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30, No. 1, pp. 89-93.

⑥ 《唐会要》卷六五:"长庆二年闰十月,太常寺奏两院礼生元额三十五人",第 1343 页。

⑦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43—44 页;屈直敏:《敦煌伎术院考略》,《敦煌学辑刊》2020 年第 2 期,第 67—80 页。

⑧ 官府礼生自署时会完整记录供职机构的名称,如 P. 3716 背《新集吉凶书仪一卷》题"天成五年庚寅岁五月十五日敦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

⑨ 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50—81 页。

⑩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819 页。

⑪ 《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349 页。按《旧唐书》本传云其祖名夔,据《唐文粹》卷六八《唐丞相故太保赠太师韩国公苗公墓志铭并序》、《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改。

表请归省乡里,“既至壶关,望县门而步”,并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①,仍与潞州本籍保持密切联系。

移居洛阳的另一支苗延嗣家族墓志自 20 世纪初陆续有发现,学者据以订补《新唐书 · 宰相世系表》上党苗氏。② 比较同时期留守乡里与移居洛阳苗氏家族的墓志,不难发现潞州当地文本的浅陋。

> 君讳宁,上党郡人也。远祖上党太守,后封襄垣侯,苗,屯留县人也。原夫构趾昆丘,耸危峰而杰秀;疏源灵派,控惊浪而标琛。周大□之胤,苗刚之后,轩冕不绝,史策具裁,今略言矣。③
>
> 夫碑志者,纪其德行,旌乎功业。俗多以文词藻饰,遂使道失其真。家叔状能,愿存实录。昔祝融命氏,得姓承源。令尹分官,楚材晋用。子孙传继,便居晋焉。④

开元十九年苗宁墓志仍沿袭“上党太守+某某侯”的格套,因拼接粗陋,难以卒读,如“苗,屯留县人也”一句,写刻时似有脱漏,又自云先世为“周大□之胤,苗刚之后”,虚造一不见于史传的人物充作祖先,似不知上古称氏而不称姓,尤见其拙。⑤ 开元二十年苗善物墓志,出自其侄苗延嗣之手,苗延嗣开元时为中书舍人。⑥ 志文所叙苗姓先世,被迁洛后士人化的苗氏家族共同接受,如苗晋卿为其叔苗嗣宗所撰墓志云:“其先与楚同姓,楚令尹伯棼子贲皇奔晋,晋侯与之邑曰苗,因而命氏”⑦,《新唐书 · 宰相世系表》叙苗氏源流,亦采此说。⑧ 留居上党苗晋卿家族的直系成员,如葬于长子羊头山北原苗氏家族故茔的苗良琼墓志、苗挺墓志,皆自云“晋大夫贲皇之后”⑨,接受了这一家族源流的新说,尤其是天宝十四载(755)苗挺墓志,书刻之精,在潞州地区墓志中极为罕见,与两京士人无异。⑩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之后,定居洛阳已五世的苗氏家族⑪,在苗延嗣曾孙苗弘本、苗蕃墓志中,仍能看到潞州本地格套的残留。

> 公讳弘本,字天锡,其先命氏于楚,后徙晋,而又因官于壶关,遂为上党人。⑫
>
> 君讳蕃,字师陈,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晋而邑于苗,世遂以命氏。其后有守上党者,惠于民,卒,遂家壶关。⑬

两志皆保留了因官徙居的说法,出自韩愈之手的苗蕃墓志,更留存了先世为上党太守这一潞州本地格套

---

① 《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第 3350 页。

② 鲁才全:《〈新唐书 · 宰相世系表〉苗氏订补——上党苗氏家族墓志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7 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4—153 页。

③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386 页。

④ 拓本刊《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19 页。

⑤ 这类错误在潞州地区墓志中并非孤例,如牛艺墓志云“帝轩黄之苗裔,周王宗伯牛颖之后也”,《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98 页。

⑥ 《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第 3091 页;赵钺、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36 页。

⑦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2 页。苗鼎、苗素墓志叙先世亦与此雷同,尤以苗素墓志所叙尤详,与《宰相世系表》几乎一致,《唐代墓志汇编》咸通 059,第 2424 页。

⑧ 《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367 页。

⑨ 苗良琼墓志,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95 页。按《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记苗袭夔有子名“良璿”,疑即良琼之讹,第 3369 页。

⑩ 杨勇:《唐〈苗挺〉墓志》,《书法》2023 年第 3 期,第 139 页。按苗挺为苗袭夔之孙,父名良仅。

⑪ 苗弘本墓志云“苗氏自公五代祖已下,咸葬于洛阳”,《唐代墓志汇编》大中 093,第 2322 页。按苗氏家族显贵者分别为苗袭夔—苗殆庶—苗晋卿、苗袭毅—苗延嗣—苗含液两支,其中苗延嗣一支定居洛阳,目前发现的墓志主要出于此系。

⑫ 拓本刊《千唐志斋藏志》,第 1128 页。

⑬ 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718 页。

中的关键要素。韩愈妻卢氏之母即出于上党苗氏①,所记当本自家族祖述。甚至在苗蕃子苗恽墓志中,对此传说有进一步的发挥,“五代祖讳袭毅,利州刺史,封上党县侯”②,苗恽曾祖苗含液墓志仅叙祖袭毅仕至“洪雅县令”③,因此不难判明“利州刺史、上党县侯”的层累性质,志文出自其弟苗恪手笔,苗恪是晚唐苗氏家族最清贵者,曾为翰林学士④,所书自非无意之笔。⑤ 于是“某某太守+某某侯”的幽灵又一次浮现出来,不过经文士雅驯化的改造后,原有格套中常见的抵牾与粗陋,已隐而不彰。如上所述,“某某太守+某某侯”最初只是墓志书写的套语,但经过反复“写入”之后,已变为苗氏家族祖先记忆的一部分,即使离开旧乡、迁居洛阳数世之后,仍时隐时现。这种文本与记忆之间的交互是刺激祖先谱系这类知识生产并日益整齐化的重要机制。

南北朝后期特别是入唐之后,一方面仍保留尊崇郡望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郡望渐失甄别士庶的意义,变成人人皆能标举的虚号。唐代墓志绝大多数皆自题郡望,潞州自不例外,另一方面《太平寰宇记》所记上党郡四姓:包、鲍、樊、上官⑥,几乎未见于墓志,透露出姓氏书记录与本地豪强实际情况的脱节。在此背景下,为弥缝贯望分离的现实,在某一姓望占据主流的情况下,散居各地的同姓者不得不借助“迁徙神话”,重构历史记忆,完成攀附郡望的叙事。由于潞州地区墓志多涉及中下层,志主事迹寥落,撰作时多仰赖“书仪式”文本,不但留下更多拼接的马脚⑦,也造成了移民史的虚相。值得思考的是,较之于明清以来流行的大槐树传说,将山西洪洞想象成华北各地移民的始迁地⑧,唐代潞州墓志中频繁提及的“因官家于上党”,形塑的是一种反向的历史记忆。大槐树传说最初起自民间,逐渐被地方士人与方志接受与容纳,而唐代潞州墓志“因宦徙居”的格套,反映的是郡望观念对中下层社会的渗透,由此可见中古社会与明清的不同。

与伪冒士籍所能获得的现实利益相比,中下层人士在墓志中借助模式化的情节所塑造的英雄祖先,更多的是某种历史心性的产物,通过重构家族记忆来建立认同与区分,墓志则成为建构这种历史心性的

---

① 韩愈撰《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题“其季女婿昌黎韩愈为其志铭”,按苗氏祖殆庶、父如兰,苗晋卿为其从父,《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 2626 页。

② 毛阳光:《洛阳流散墓志汇编续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24 页。

③ 《唐代墓志汇编》残志 063,第 2572 页。按苗含液墓志记其祖名“袭”,而苗晋卿祖名袭夔,知当以“袭毅”为是。

④ 关于苗恪的生平,参读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7—299 页。新见苗恪为妻卢含所撰墓志,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苗恪生平的认识,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三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50 页。

⑤ 恰是从苗袭毅这代人开始,苗氏开始迁居洛阳,逐渐士族化,并摆脱了潞州本地的书写格套,苗氏家族士人化的关键人物是苗延嗣,因此苗恽父苗蕃、子苗景符墓志皆未提及苗袭毅。

⑥ 《太平寰宇记》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37 页。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潞州六姓“鲍、包、陈、樊、苞、尚”,同样少见于墓志。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4 页。

⑦ 同样胡人墓志由于研究者众多,迁徙神话编造粗陋,更易被学者识破,如《元和姓纂》卷二记本姓鱼、祖居灵武的虞庆则“状云,本自会稽徙焉”,便为岑仲勉揭出。《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29 页。在士人墓志中这种模式化的情节,亦大量出现,只是未被充分识别。

⑧ 关于大槐树传说的形成与影响,参读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乔新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第 50—58 页。陈晓伟:《华北移民祖先记忆的塑造——关于洪洞大槐树传说文本的讨论》,《中华文史论丛》2022 年第 4 期,第 343—373 页。

文类。① 这种历史心性具有跨断代的特征,明清族谱中对英雄祖先的描述与潞州墓志有相近的一面。因此在离析墓志格套、揭示英雄祖先的攀附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行用与演变,创作、接受这些模式化情节人群身处的历史情境与行为逻辑。

余 论

金石学研究的传统推重正史有传人物的碑志,文词多出自一流文士之手,除敦煌吐鲁番文书外,潞州地区墓志大约是唐代最基层的史料,这类墓志大量借鉴书仪式的文本制作,有意无意地"误记"或"发明"了家族先世与仕宦经历,实际上在更广的层面上反映了唐人使用墓志的实态。在潞州墓志中,有时会坦陈不知祖父以上先世的名讳,如连思本及妻冯氏墓志云"曾祖忘讳。祖讳存,祖母郭氏"②,张春墓志"不立先代之讳"③,安士和墓志记"祖已上衔讳,阙而不录,考讳良素"。④ 王行实墓志稍有掩饰,"祖行远,谨不具录"。⑤ 这类情况不仅见于潞州,或属地方社会的常态,如登州许童墓志亦云"曾以遇世离失之家代,罔记名讳尔"。⑥ 王在璋墓志曰:"本贯幽州人也,三代尊讳不记所任。"⑦迁居洛阳的路君提供了一个极端的案例,"曾祖不得讳,皇不仕,夫人不得姓氏。祖亦不得讳,皇不仕,夫人不得姓氏。父亦不得讳,皇不仕,夫人不得姓氏",卒于光化元年(898)的路君本人,至天福元年(936)与妻郭氏合葬时,甚至其子敬章、敬温亦不知生父名讳,不得不在墓志中直书"公不得讳字"。⑧ 梁末侯景称帝后,立七庙,由于出身卑微,"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标"⑨,北宋初亦有类似的例子。

> (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辛亥)大同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刘廷翰当追封三代。廷翰起微贱,不能记其祖名,上亲为撰名,书以赐之。⑩

由此想到不少中下层士人墓志,祖父、曾祖名讳阙空未填,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恐怕是不记祖父以上各代的名字。侯景因不知祖父以上名讳,其谋主王伟"制其名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⑪,这一做法与潞州墓志制造"英雄祖先"的过程可谓异世同调。石志在唐代虽"贵贱通用之",不再作为社会身份标识⑫,但这类不知先世名讳者,大约标识出使用墓志地方士人阶层的下限,考察其知识水平,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格套在中下层人士墓志撰写中会得到广泛行用。

"因官逐任"自是中古墓志中常见的家族迁徙理由,但在潞州墓志中,绝大多数皆自云先祖因宦徙居,远超其他区域出土墓志的比例,若将这类记录视为直接或间接的移民史材料,那么从汉至唐,当地百

---

① 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情节三个概念出自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35—238 页。作者指出"历史心性虽然只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思考、组织与叙述历史的文化心态,但它产生自社会现实之中。它规范或导引'历史'的想象与书写,如此产生的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互为表里,因此也造成一些社会现实的延续",第 48 页。

②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显德 035,第 433 页。

③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天成 010,第 139 页。

④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832 页。

⑤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天福 045,第 282 页。

⑥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天成 006,第 134 页。

⑦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乾祐 015,第 338 页。

⑧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天福 001,第 210 页。

⑨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860 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505 页。

⑪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第 860 页。

⑫ 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56 页。

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都迁自外埠,这在任何人口史、移民史研究中都不能获得支持。① 综合各种史料,可以判定中古时期潞州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移入或更替,社会结构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域。谢明良曾分析山西地区唐墓出土的陶瓷,指出山西、辽宁、河北及河南中北部等地区与陕西存在相异的丧葬习俗,其中又以山西太原、长治一带墓葬表现得最为纯粹和突出,从而形成一相近的“明器文化圈”,从潞州经穴径道可达相州,亦可利用著名的太行八陉之一滏口壶关道经涉县抵河北磁县、邢台等地;安阳与幽州也有道路连接。顺畅的交通运输或亦可为相近明器文化的形成或传播提供便捷的途径。② 借助墓葬物质文化遗存勾勒出来的这一地域范畴不仅属于“逝者”,更属于“生民”,即这一地域中的人群不但使用风格相近的明器及组合,也存在密切的人员与经济往来,方能在墓葬文化上相互影响,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直观表现。

尽管中古潞州社会,可能除了粟特胡商之属,并没有远距离、大规模的移民③,造成人口结构的重大改变,不过周边地区人口的移入与迁出并不鲜见。如田万昇墓志云“本松柏并州人也,迁居潞□龙潜处,向四纪焉”④,秦承恩墓志记“远祖因官于太原,子孙相承,分枝流派,遂为太原祁县人焉……公因避地移家,久居上党,经五十余年矣”⑤,两族皆因安史之乱,从太原迁至潞州。宋庆墓志载“西河郡人也,远祖因官,故今为上党人”⑥,任黄中墓志云“汾州西河人也……厥后从官就任……家于漳浦”⑦,宋氏、任氏都是汾州大姓,两姓在潞州墓志中也经常出现,大约与移民有关。宋嘉进墓志云其先晋州临汾人⑧,盖来自晋州。宋晏妻赵氏墓志载“顷以曾祖因官之任于泽州,子孙绪宦乎上党,遂为潞人焉”⑨,中唐之后,泽、潞同隶昭义军,往来尤为密切。张朝清及妻任氏墓志曰“远祖因官于洺州,子孙遂为永年县人矣。后因避地于潞已经卌五年矣”⑩,赵美墓志云“祖代邯郸,因寓到此”⑪,永年、邯郸皆属洺州,洺州位于太行山以东,但同属昭义军辖下。孙公乂墓志云“夫以太行孟门之固,羊肠鸟道之险,一旦沟塍连接,中无隙地,无非襁负之所至也。故河内之民加少,高平之民加多”⑫,叙志主治泽之政绩,招徕怀州之民,邢播墓志“府君父讳恕,字宽仁,其先邢州南和县人也。因任党阳县令,遂置别业,即今高平县北邢

① 北魏前期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曾将大量人口强制迁居至平城周边,也包括了太延五年灭北凉之后,“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0 页)。首先这类移民多以中上层士人、僧道、工匠等为主,并非家族整体迁徙,《魏书》卷五二《刘昞传》:“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第 1161 页,后可能陆续散居各州。总体而言,以居于山西北部为主,未有材料证明这一时期山西东南部有大规模的人口导入,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7—130 页。唐代的情况,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 2 卷比较开元天宝与元和时期的户数,指出安史之乱后,潞州户数减少 3.8 倍,尽管版籍上户数的多寡并不完全反映人口的增减,至少说明安史乱后不存在大规模移民进入潞州的现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1—235 页。

② 谢明良:《山西唐墓出土陶瓷初探》,《中国陶瓷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16 页。

③ 潞州地区尽管发现了不少昭武九姓墓志,毛阳光《墓志所见唐代潞州地区的粟特人》,《中古中国的知识与社会》,第 78—97 页。这并不能证明存在从西域或河西走廊迁来的远距离移民,潞州粟特人的墓志行文与当地普通汉人相类,并无民族与宗教色彩,主体或是从邻近地区迁来,如康璀即从中山移至高平,《洛阳流散墓志汇编续集》,第 690 页。

④ 《唐代墓志汇编》大和 082,第 2155 页。

⑤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614 页。

⑥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417 页。

⑦ 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27 页。

⑧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 0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2 页。

⑨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775 页。

⑩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 627 页。

⑪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长兴 014,第 173 页。

⑫ 《唐代墓志汇编》大中 054,第 2289—2290 页。

村是也”①,以上所记虽是怀州、邢州与泽州之间的人员流动,由于泽潞密迩相接,亦算作侧面的证据。因此,中古潞州除了与山西境内的太原、汾州、泽州外,也通过天井关与河南怀州、太行诸陉与河北邢州、洺州、磁州、卫州等地有密切的往来与交流,正是借助这些人的行动,我们感知到潞州地区商业活动、社会风俗、物质文化等要素的边界,为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能。

The Writing Model of Epitaphs and its Evolution in L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Error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Qiu Lu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epitaphs of the Tang Dynasty were unearthed in Luzhou (潞州), mostly related to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In many of the epitaphs, the stele erectors claimed that “their ancestor moved from his native place to take office in this area” or “their ancestor was Prefect of so-and-so shire + so-and-so Marquis”. As this was a kind of writing model, the epitaphs were mostly put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texts of the “written ritual” (书仪式). As these epitaphs have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y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The writing model of the epitaphs and the form of their cover also changed with time passing by, and the writing model of epitaphs in Luzhou (潞州)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gradually becam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fter the Miao's clan of Shangdang (上党苗氏) moved to Luoyang (洛阳), they gave up the simple writing model of epitaphs they had used in Luzhou, and completed the literatization of their ancestors' narratives, in the form of “Prefect of Shangdang + so-and-so Marquis” still appearing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ir family's memories.

Key words: Luzhou epitaph (潞州墓志); writing model; the Miao's clan of Shangdang (上党苗氏)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同光 006,第 103 页。